

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李学武◎著

蝶与蛹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与蝶蛹

李学武◎著

——中国当代小说成长主题的文化考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蝶与蛹：中国当代小说成长主题的文化考察/李学武.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6

(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ISBN 7-5004-4169-X

I. 蝶… II. 李… III. 小说—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6543 号

责任编辑 刘三华

责任校对 郭娟

封面设计 任菊华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125

插 页 2

字 数 192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1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总序

蒋述卓

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的兴起，是20世纪末全球学术界一个令人瞩目的景观。值得说明的是，“文化研究”一词在当下学术语境中仍有一定的歧义性：就其狭义而言，它指的是20世纪中叶发端于西欧诸国、90年代初陆续介绍到中国的某种批评潮流，其范围涉及大众文化、文化身份、传媒、文化机构、文化消费、权力话语、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政治阐释学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文化研究”作为涵义广泛的批评潮流的共名，本身的领域和对象变动不居，暂时也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学科和流派，但它在研究思维、操作方法、价值立场等方面仍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借用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界一本专门性学术出版物的“前言”语，狭义的文化研究的特征大概就是它的“实践性品格、政治学兴趣、批判性取向以及开放性特点”（《文化研究》第1辑“前言”，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文化研究”往往还有另一层涵义，这就是对它的广义的理解，这种“文化研究”有点类同于“泛文化研究”。就文学研究与批评而言，此类“泛文化研究”把人类历史累积的各种文化成果作为话语资源，展开对文学的多向度阅读与理解，寻绎文学活动中的文化要

素，并从更为深广的语境中赋予文学以新的质素与空间。人们对“文化研究”或狭义或广义的不同理解与运用，虽然视野悬殊，着意与归宿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我们依然可以发现二者的某些共通之处，比如对文学存在的独立性与依存性加以考察、将静止的“文本”同活动着的“世界”结合起来诠释、打破传统的学科阈限而尝试多种互阐互证……诸如此类，都在表明一个事实，即文学研究或文学批评的多元时代的来临。

毋庸置疑，文化研究的兴起有其深广的社会语境与学术渊源。20世纪全球性的学科细化，某种意义上加剧了知识的壁垒；而形式主义一脉批评论调的持久高张，虽然表面上维持了文本的“内在完整性”，却严重忽视了这一完整性得以存在的外部语境。此外，20世纪中后期，文学研究或文学批评的功能似乎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批评家们不再满足于对文本自足性的简单读解，而愈发注重揭示隐藏于一个独立文本内部的文化秘密；文学研究或文学批评的这种“隐喻性”，大大扩展了它对社会文化的解释力与干预力。批评的上述种种变化，共同唤起了文化研究的勃兴。批评的文化转向，也跟文学自身的嬗变密切相关。20世纪的中外文学，不约而同地经历了一场由杂到纯、再由纯变杂的演变：先是由杂到纯，不仅把古老的广义的人文写作划分为文史哲等不同方式，而且文学文体的分化也日益细密；20世纪后期的文学则从这种文体的纯粹中突围出来，走向边界模糊的杂文学：作家们常常把小说写成随笔，把论文写成故事，将诗歌的精神融入小说，而散文更成为一种文体跨越的实验基地。文体边界的有意模糊，文本意义的多重隐含，使得对某部作品的单纯审美分析未必完全失效，但至少已不再成为决定性的价值宣判。大众文化语境中审美分析的有限性，必然要求批评寻找其他的突破路径，文化研究便适逢其时应运而生，并日益繁茂起来。因此，当下的

文学批评，更多地是在寻找着种种边界或结合部，比如文本自身与外部语境的遇合，本质意义与阐释价值的对话，审美分析与历史视野的汇通，结构研究与文化研究的通融，等等。不仅文学走向了一种广义的“大文学”，文学批评也滑向了某种广义的“大批评”。这正符合了这个时代对话的、实践的、杂语共生的特征。

简言之，文化研究的意义，就在于从文学的角度理解文化，从文化的视野阐释文学。而这两点，正映现了狭义的文化研究与广义的文化研究入思与取意的不同视角：前者注重的是文学的阐释功能，突出的是批评的弥散性；后者强调的则是深化对文学自身的理解；换言之，前者把文学理解当做手段，后者把文学理解当成目的。我们的这套“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所着意的更多是后者，即把各种文学、诗学现象置于特定的时代氛围与历史语境中，从较为广阔的文化视野中考察和透视这些文学与诗学现象，达到对其更加全面、更加深入的理解。

本丛书共六册，据其内容大概分为三类。首先是两本“文艺文化学”方面的书：《文化视野中的文艺存在——文艺文化学论稿》（蒋述卓、李凤亮等著）与《批评的文化之路——文艺文化学论文集》（蒋述卓主编、李凤亮副主编）。前者是著作，后者是论文集；前者侧重于对文学意义的多重考察，关注的是批评理论，后者则侧重于批评实践。“文艺文化学”作为文艺学学科的一个新兴方向，近年来受到不少学者的关注。这一研究的动机乃在于整合人文学科的既有知识，通过比较给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学以新的定位。比如《文化视野中的文艺存在》一著即通过文艺与哲学、宗教、道德、语言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比较，既在本质上对文学的意义与价值加以重新认识，又从研究角度将文学与相关人文社会科学进行勾联与区分，目的仍是进一步理解文学与文学研究。上述内容构成该书的“上编”。而“下编”则将文

艺活动置于更大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考察文艺与社会风俗、社会文化心理、大众文化的相互关系，并从艺术生产角度对现代文艺的生产与消费、传播与反馈等机制进行解读，以试图让读者从更具时代感的视点体验和理解当代文艺的多元发生与基本走向。相比之下，《批评的文化之路》这本论文集的内容更为丰富庞杂一些，共收录33篇文章，编者将其分为“宗教文艺的文化阐释”、“文艺美学的文化观照”、“文学批评的文化解读”、“跨文化视野中的比较文学”、“多元文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学”、“大众文学与大众文化”等六辑。这些论文，不仅比较了文学与其他人文学科的关系，还比较了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的关系；而对几个文学批评现象的阐释，内在地贯注着文化研究的观念；对比较文学、大众文化的解读，作者们运思为文时，也大多渗透着比较诗学与比较文化的思路。总体上看，虽然论题众多，但仍可集中到几个要点；而贯通全书的，是一种在文学——文艺——文化——文明的有序递演中，为文学批评开拓文化之路的视野，这也正是该书编选者们的初衷所在。

丛书的第二类，包括两本研究中国当代文艺现象的专题性论著：《城市的想象与呈现——城市文学的文化审视》（王斌等著）和《蝶与蛹——中国当代小说成长主题的文化考察》（李学武著）。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现代化进程的逐步加快，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随之重新启动并很快步入发展的快车道。90年代，市场经济的实行进一步催生了城市的活力，城市的规模与数量以空前的速度激增，形成极其迅猛的城市化浪潮。在某种程度上，城市化浪潮已经成为90年代最为重大的社会景观。应对于当今中国城市的蓬勃发展，城市文学与城市电影也于80年代初起步，并在对城市社会巨大变迁所作的同步叙述中，迅速走向繁荣。其中，城市文学所取得的成就更引人

注目。在 80 年代，城市文学还只是文坛多元复调中的一种声音，而在 90 年代已然处于十分显要的位置，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整个文坛的主流。相比较而言，城市电影的发展势头相对较弱，但它无疑也是 90 年代影坛中十分重要的一支。《城市的想象与呈现》一书，在深广的层面上，对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城市文学与城市电影的审美流变进行了剖析，对其文化内涵进行了揭示。尽管有些地方略显单薄，但是通过它们，可以使我们对于当今城市社会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并为今后进一步研究奠定了有效的基础。《蝶与蛹》一书选取的则是中国当代文学中一个重要、但尚未获得重视与充分讨论的论域：成长主题和它在文学文本中的丰富而复杂的呈现方式。“成长”是文学中一个古老母题，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和蔚为壮观的文本序列；但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它被深刻地内在于革命文化内部，因而也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和面貌，并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而改变着。《蝶与蛹》正是通过对古老成长主题形态的梳理，细致分析了当代中国文学中成长故事的几次变奏。它既是对当代文学中成长故事这一母题的深入研究，又在一个点上展示出当代文学史的一个侧面。在对中西方成长小说创作的分析中，该书涉及文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纵横捭阖，形成了相当完整的论述结构。十分难得的是，该书在母题研究和文学史研究两个方面建立了自己独特的观察、思考与分析的视点，同时保持着对文学文本的敏锐观察和感知；研究体现了一种值得提倡的良好方法与作风，即：既从文学实践（创作及与创作有关的文学生态）出发，不断走向理论；又以理论为依据，阐释和把握现象，不断深入文学实践。因此，在以深度分析和理性把握取胜的同时保持了丰富的审美分析，从头至尾都体现出一种可贵的有意味的“可读性”。

丛书的第三类是两本涉及文学（文学批评）现代性问题的著

作：《沉思与怀想——对话、想像与批评的现代性》（李凤亮著）和《文学彼岸性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彼岸性问题的一种文化哲学阐释》（胡志颖著）。《沉思与怀想》是作者的一本论文集，作者将所收文章分为四辑，大体可看出他近年来的学术兴趣：第一辑“存在的沉思”是作者对法籍华裔小说家米兰·昆德拉的一组散论。作者对昆德拉颇有解读之趣，完成过一个省级的规划项目，目前又在主持一个“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辑中的八篇文章，内容分别涉及作家评传、翻译研究述评、作品分析、争鸣探讨等，与作者业已出版的《对话的灵光——米兰·昆德拉研究资料辑要》和即将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诗·思·史：冲突与融合——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引论》构成了一个昆德拉研究系列，显示了作者对此一领域的开拓之功。第二辑“话语的寻索”通过对一些重要作家、批评家的分析，探讨了对话理论、新批评、比较诗学、人文启蒙与现代性反思等思想与学术话题。第三辑“批评的批评”是作者对几位广东批评家的解读。由于对象的熟稔，这一解读对当代岭南文学批评特征的揭示是生动而到位的。第四辑“城市的怀想”借助于对城市文学与文化现象的观察与表达，反映了作者对都市文明的考量与思索。该书作者熔理性沉思与感性怀想于一炉，从几个不同角度进入文学批评现代性的反思和言说，显示出一种较为可贵的理论勇气。特别是该书的诸种话题不同程度地围绕着“对话”、“想像”等充满现代性意味的关键词来展开，可以使我们感受到作者对思想话题敏锐的捕捉力和独特的人思理路。据我所知，作者目前正以“文学批评现代性”为论题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相信假以时日，应能在这方面推出更加集中与深入的研究成果。《文学彼岸性研究》是作者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扩充而成的一部论著。作者将“彼岸性”视为中国古典文学的某种精神终极，将其置于一种

非常规的语境中加以探讨，认为“彼岸性”永远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精神领域。作者旨在阐明，中国古典文学（包括文论）中的某些作品，实质上是在现实中所达到的高居一切之上的境域。显然，作者并非一般性地再论文学的审美品格，而是通过文化比较揭示中国古典文学，在其他非汉语文本始终未能达到的“神圣”和“虚无”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卓尔不群。这无疑向传统文学理论提出了一个异乎寻常、在非审美（非常规）情境中展开的文化哲学问题。这个问题或许能为探索中国古典文学的本质意义，以及研究文本创作和阅读经验提供新的借鉴和启示。

丛书的作者们大多是高校的年轻学人，他们的文学见解与思想述说，也许还称不上十分成熟老到，却显示出独立的思想姿态与新锐的批评精神。我觉得对于当下的批评建设而言，这种姿态与精神是甚为可贵的。

文化研究目前方兴未艾，它有着广阔的空间与前景。我希望这套“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能引起学术界同行的关注与批评，从而有效地加入到“文化研究”的广泛对话之中。当然，对于我们自身而言，这套丛书的出版，只是我们开展相关研究的一个起步，希望有更多的研究者加入到这个不断更新的研究领域中来。

2003年2月于暨南大学

序

曹文轩

“成长主题”是中国当代小说的一个基本主题。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始终未见学术界对这一主题加以关注与研究。李学武的这部论著以如此大的规模且又如此深入地对这一主题加以描述与剖析，这在中国大概也算得上是开天辟地的事情了。

天下文章，无非两路。一路是在已被多人所做的文章之上再做文章，此时，比的是“超出”，即在前人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现与更深刻的见解。做好这一路的文章很不容易。若要在已被人做烂了的题目里再有所发现，第一要做的功夫就是对所谓“已有的成果”了如指掌，而这些成果（文章）往往满坑满谷、浩如烟海，即便如此，那也要硬着头皮钻进去——不知此知彼也就谈不上有新的拓展。这种竭泽而渔、柳暗花明的事情，往往耗尽一辈子的心血就做成一两件。过去的中国学者似乎特别青睐这一路的文章也特别喜欢做这一路的文章，一个题目竟使成千上万的人趋之若鹜，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好不热闹，穷经皓首，竟其乐无穷。这一路的文章也往往更容易被认定为“学问”。还有一路文章，用的是另样的思维方式：扭过脸去，将目光从众人所看的对

象上挪开，去看别人疏忽了的、看也不看的地方，看着看着，看出了一个完全崭新的题目，这个题目犹如一块貌似荒凉而其实十分丰饶的处女地，一旦开垦，就会有特大收获。这一路文章，只有那些不安分守己的人、敢于从人群中挣脱出而独游一方的人、目光有神具有寻觅能力的人才会去做，也才做得。在我的印象中，西方学人，很有一些是喜欢写这一路文章的，也正是因为如此，西方才会思潮迭起，才会有新的体系的不断涌现。这些文章初时，也许并不健全，甚至还显得很幼稚，但后来架不住有许多人跟上，不久就成了一门成熟的课题或学问。这前一路文章，是老实人做的文章，而这后一路文章，是聪明人做的文章。两路文章，孰高孰低，大概难说——恰当的说法是两者假如都做好了，价值同等。总做老实人的文章不行——这样地做下去，总难有一个更宽广的大天地，而大家都去做聪明人的文章，狗熊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学问没有一个延续性，大概也不行。

李学武的这部著作，所做的是属于后一路的文章。借时下一句用于学术评定的行话叫作“填补空白”。做这个题目的难处在于没有太多的成果可以借鉴，好处在于处处有话，处处可出新意。这几年，我指导硕士生、博士生做论文，一般情况下都暗示或者干脆明示他们做这一路的文章。这一来是因为当代文学研究本也没有什么学问上的积累，做那种老实人的文章，是不可能像做古代文学方面的文章那样做得有滋有味的（引经据典、如数家珍的自得，穷尽一切、钩沉出新的自足，也真是难得的学术快意），二来是觉得中国更缺的是这一路的文章，三来是因为觉得做这样的文章，一旦题目找准了，也就好做了——题目好，这篇文章实际上就先有了七分。李学武的这个题目，从博士论文开题论证到预答辩再到最后的正式答辩，都是被大家一致说好的。

西方专有一路小说——成长小说

此类小说从初见雏形到成型定格再到独领风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背后，实际上是一部教育史、思想史的发展过程。

文艺复兴时期的个性解放，到少年儿童这里实际上是有所保留的。他们虽已经升达人的位置，但只是缩小了的成人。表面看来的尊重，其实是以忽略他们的特性为代价的。他们被混同于一般人，而在实质上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尊重。此时，他们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时，是没有任何特色的，他们的心灵以及行为依然是一种被成人所看到的或者说是被成年人所以为的样子。他们的成长过程以及在成长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令人吃惊的、成人不愿意看到的诸多方面，被作家们有意无意地撇开了。尊重带来的却是回避。

随着“完整的人”的概念的形成，西方文学才有了真正逼近儿童世界的可能。

这个概念的提出与得到重视，意味着从前在思想与文学的视阈中，儿童没有得到完整的呈现，由于我们的喜好与希望（比如我们不愿看到他们人性中的丑陋一面），他们的世界被我们缩略了，他们不是完整的人。现在提出“完整”，就是说我们要正视，要对儿童世界进行全景式的书写。

这个概念实际上不仅仅只有“看到我们所看到的一切”这一层意思，它还有另一层意思：“看到我们以前所没有看到的一切”。尽管我们这些成人是从那个世界走过来的，但因为教化等原因，我们在成为成人的时候，对那个世界的感觉已经钝化了，我们一路走，一路丢失了许多记忆，并且是一些关键性的记忆。

那个世界远不像我们在成年时所看到的那么简单，它有许多十分微妙的东西，它的复杂程度在某些方面甚至超出了成年世界。即便是我们没有丢失这些记忆，也会因为我们认知力量的薄弱而无法洞见那个世界的全部秘密。现在我们要长驱直入这个世界，对那个世界进行全面的清理与盘点。随着我们直面那个世界的勇气的增长与我们知性的日趋发达，我们已经看到和预感到那个世界的深处的丰富多彩。通过观察与分析而获得的一切，使我们欣慰地看到文学正在获得一个新的广阔的天地。

促成“完整的人”之意识形成，是许多天才的深刻的思想家们的功绩。其中，弗洛伊德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他的许多怪异的观念到底有多大的可靠性，我们且不去管它，但他的核心话题——性，却使我们无法回避，并不得不承认这一话题的真实性。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话题，也是一个十分具有魅力的话题。多少年来，这个话题始终是我们的热门话题。在弗洛伊德的全部话题中，最具魅力的话题却是有关儿童的性的。他的“俄狄普斯情结”（恋母情结）之类的学说，振聋发聩，甚至使我们所有的人在回忆自己的纯真的童年时代时感到汗颜与无地自容。他不动声色地一一地向我们数说着我们童年时代的那些行为所具有的性的象征与性的语义。在此之前，性的话题一直局限于成人世界而从未到达过儿童世界。弗洛伊德告诉我们，这头小怪物早在我们还是婴儿时就已经潜伏在我们的躯体之中，甚至已经有所作为。而对一个人的少年时代，还不能堂而皇之地讨论他的性——还将他看成是与性无关的天真无邪之物，则是懦弱而虚伪的。弗洛伊德将性看成是一个人成长的因素甚至看成是成长的动力。这一惊世骇俗的见解对文学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也使成长小说更具特质。得这一理论的诱发与支持，西方小说写十三四岁到十六七岁的少年的性萌动、性困惑，一时成为时尚。时至今日，已变得有点肆

无忌惮。电影《教室别恋》，写一个少男与她的女教师的性行为，已不加掩饰。而德国当代作家的长篇小说《生死朗读》，在写一个十五岁的中学生与一个大他近二十岁的女人之间的性爱关系时，已不再有任何的惊诧。性成为公开的主题。当然，它不是惟一的主题——它是与成长的主题联系在一起的。性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一大课题——这一课题无法回避。而与性联系在一起的交往，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故事。这些故事有丑陋的，有美好的，但无论是丑陋的还是美好的，都转而成了那个正在成长中的主人公获得精神提升的因素。《生死朗读》中的性爱，没有使那个少年堕落，反而充满诗情画意。当女主人公后来被认定在纳粹时期犯有罪行而被捕入狱时，当年纯洁的性爱已成为让男主人公刻骨铭心的美好回忆，代之而起的则是悲悯情怀的产生。性在这里点化了生命与人生。

遵循“完整的人”的含义，《绿衣亨利》、《在轮下》等成长小说，详细地描述了一个少年在往青年过渡时其世界观形成的过程。作家的注意力始终在“成长”二字上。因为是诉说成长，这些作品往往选择第一人称，采用自传体的叙述方式，将“自己”过去的经历——道来。与一般作品不同的是，这些作品大多没有太完整的故事，其形态正如现实人生是由无数的碎片所组成的一样。而正是这些看上去无足轻重的碎片，却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发挥了令人不可思议的作用。

随着成长小说的出现，随着“完整的人”之概念的形成，成长过程中的人性的完整与成长环境的完整都得到了深刻的显示。其中，有两部小说是当之无愧的经典，一是《蝇王》，一是《麦田里的守望者》。当我们对比这两部小说时，我们感到非常有趣：《麦田里的守望者》通过一个叫霍尔顿的十六岁少年的眼睛，看到的是这个社会的黑暗与人性的丑恶，而《蝇王》则将一群孩子

抛到一座孤岛上，让他们与社会脱离开来，但以杰克为首的几个孩子，却暴露出人性中卑下的品质。这个杰克野心勃勃，虽然才十几岁，但权力意志已十分顽强，他甚至是残忍的。无论是《麦田里的守望者》对社会的揭露还是《蝇王》对孩子自身的揭露，两者都是毫无保留的。尽管这两部作品并不是专为孩子写的，但它写的就是孩子，并且是真实的，其笔调和写法与我们所说的成长小说并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完全可以将它们看成是成长小说。它们的存在，使“清白无辜”的童年时代结束了。

成长小说并非只是消极地理解“完整的人”，它在走向所谓的“完整”时，包括了它理想中的“完整”——这一点甚至费去了它大部分心思。作为它前身或者近亲的“教育小说”，在实现“完整”时，是将教育放在显赫的位置上的。“教育”与“成长”这两个概念始终是捆绑在一起的。理想的成长从来就不是一种自在的自然状态。“树大自然直”的说法是逃避教育的借口。只有经过教育的成长才是有质量的成长。这里的教育不是指学校的知识传授，也不是指道德训诫，而是文学所要进行的教育。这种教育是以特别的方式进行的，它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也许是最为重要的教育。

一般人也许不可能将契诃夫的《草原》看成是一部成长小说，而我却愿意。其理由还不仅仅在于它的主人公是一个孩子，而是在于它的主题：大自然对一个成长中的孩子的教育。这部几乎用去三分之二的文字描写风景的小说，是契诃夫全部小说中的经典。那辆“没有弹簧的、破旧的带篷的马车”，驶出了一个小小的县城，来到草原上，开始了似乎漫无尽头的旅程。一个九岁的男孩叶戈鲁什戈，看上去似乎是这辆马车上一个不重要的人物，其实他是主角，是契诃夫小说的焦点。一切都是用这个孩子的眼与心看到的。淡紫色的远方，在凋萎的青草上空盘旋的白嘴

鸦、旋风、雷鸣、草原菊，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无意义的。契诃夫为什么用那样宝贵的笔墨去“冗长”地写风景——一连几页都是风景？他是在向这个九岁的男孩展开自然这本大书。颇有意味的是，这个孩子是去上学的。但他进入校门的时间，并不是在几天以后，而是在马车一滚动上草原之后。空旷、寂寞、孤独、单调却又无比丰富的草原，静静地躺在阳光下让这个孩子阅读着。他的学习早在到达学校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并且是非常重要的学习。这种体验，将深刻地留存在他的记忆里。草原，连续不断的风景，不仅让他看到了什么，也让他感受到了什么。草原的美丽、悲哀、苍凉与博大，不仅将作为一种感情，也将作为一种精神注入这个九岁男孩的血液与灵魂，他永生永世心存感激。因为，多少年后，他将会发现，草原给了他生命的美与质量。

西方的思想家与西方的文学家就教育与成长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在进行孜孜不倦的思索。洛克、卢梭等都有过十分精彩的论述。其中，卢梭的思想不仅丰富和壮大了人文精神，也对文学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观点直接成为教育小说/成长小说的资源与动力，使文学发现了新的视阈。“我们的才能和器官的内在发展，是自然的教育；别人教我们如何利用这种发展，是人的教育；我们对影响我们的事物获得良好的经验，是事物的教育。”我们可以在同一时期的西方的教育小说/成长小说中找到这些思想的痕迹。

李学武的著作，论述的是中国当代小说中的成长主题，但话头却是从描述西方的成长小说开始的。论著从一开始，就给人一番开阔的视野。它先给中国当代小说的成长主题，呈现出一个巨大的参照系统，尔后再对中国当代小说的成长主题进行描述与分析。用这样的方法进行考察是行之有效的。她发现，中国当代是没有经典意义上的成长小说的，但成长主题却在当代小说中一直